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中/国/企/业/行/为/治/理/研/究/丛/书 ·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Firms' Relocating Proces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Firm-region Co-evolution.

企业-区位共演视角下的 企业迁移过程实证研究

吴 波 著

Relocation Co-evolution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企业行为治理研究丛书

公司治理卷

企业—区位共演视角下的企业迁移过程实证研究

吴波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企业—区位共演视角下的企业迁移过程实证研究 / 吴波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78-2007-9

I. ①企… II. ①吴… III. ①企业发展—研究—浙江
IV. ①F279.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4117 号

企业—区位共演视角下的企业迁移过程实证研究

吴波著

责任编辑 郑建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88 千

版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78-2007-9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本著作是以下项目资助成果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制造企业逆向迁移、网络重构与高端知识获取:基于三阶段网络演进的视角(编号:71372009)”;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网络重构、双重嵌入与迁移企业绩效:对长三角地区企业迁移的分析(编号:71202111)”;

➤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江青年项目,“浙江制造企业逆向迁移、知识网络重构与内部能力跃迁机理实证研究(编号:13ZJQN057YB)”;

➤ 浙江省软科学重点项目,“浙江制造企业群体迁移的现状、模式及分阶段引导策略研究(编号:2016C25007)”;

➤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商研究中心)重点项目。

总 序

企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的开展而壮大。作为现代经济中的基本单位,企业行为既是微观经济的产物,又是宏观调控的结果。从某种意义而言,企业行为模式可被看成整个经济体制模式的标志。中国企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然形成自身的行为体系和价值系统,但是面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及国内改革步入全面深化、攻坚阶段的特殊历史背景,如何形成系统的行为治理框架,将直接决定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塑造及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从社会学的研究上来看,人类社会就是一部社会变迁的进步史,社会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转型就是社会变迁当中的“惊险一跳”,意味着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新的发展轨道。30 多年来,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一时期,从经济主体的构成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制度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而国际环境也经历着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十一五”末期国际金融海啸来袭,经济急速下滑,市场激烈震荡,危机对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影响至今犹存。因此,国家将“十二五”的基调定为社会转型。这无疑给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素材,同时也给管理学研究者平添了十足的压力。

作为承载管理学教学和科研任务的高校,如何在变革的时代中有效地发挥自身的价值,以知识和人才为途径传递学者对时代呼唤的响应,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论题。这个论题关系到如何把握新经济环境下企业行为的规律,联系产业特征、地域特点,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为企业运营、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国际化竞争和较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逐渐显现出一种新观念、新

技术和新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转型模式。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企业则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促成者。因此,企业也就成了我们管理学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焦点。在经济社会重大转型这一背景之下,一方面由于企业内部某种机理的紊乱,转轨时期企业目标的交叉连环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合理作用,企业行为纷繁复杂,企业既有可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强劲推动作用的长远眼光,也存在破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短视行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企业不仅要营利负责,而且要对环境负责,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发展中面临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部分企业还出现生产经营困难,这些都是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转型”大师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曾言,“到了彻底改变企业思维的时候了,要么转型,要么破产”。企业主动预见未来,实行战略转型,分析、预见和控制转型风险,对于转型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企业想在它的领域中有效地发挥作用,行为治理可以涉及该企业将面临的更多问题;而如果企业想要达到长期目标,行为治理可以为其提供总体方向上的建议。在管理学研究领域,行为治理虽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却提供了一个在新经济环境下基于宏观、中观、微观全视角来研究企业行为的良好开端。

现代公司制度特指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法人制度,其特点是企业的资产所有权与资产控制权、经营决策权、经济活动的组织管理权相分离。对于公司治理而言,其治理结构、方式等的选择和演化不仅受到自身条件的约束,同时还受到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根据North(1990)的研究,相互依赖的制度会构成制度结构或制度矩阵,这些制度结构具有网络外部性,并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这使得任何想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都会受到其他制度的约束,也使得公司治理产生路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打破路径依赖,优化治理结构,从制度设计角度出发进行行为治理便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此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精神,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的通过,则将促进科技创新的制度红利依法得到释放。我国“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把科研攻关与市场开放紧密结合,推动技术与资本等要素的结合,引导资本市场和社会投资更加重视投向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新时期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科技创新需要科技资源、企业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有机结合,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企业行为治理,将各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则成为促进科学技术向第一生产力转化所面临的新命题。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制度、科技、创新还是从公司治理、企业转型角度出发,企业的目的都是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而战略则成为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战略强调企业与合作伙伴的互动,如何通过把握新时期、新环境来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战略决策以获取竞争优势,则成为企业在新经济环境下应担起的艰巨任务。另外,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同时,应当寻找能为企业和社会创造共享价值的机会,包括价值链上的创新和竞争环境的投资,即做到企业社会责任支持企业目标。履行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不只是做一个良好的企业公民,也不只是减轻价值链活动所造成的不利社会影响,而是要推出一些能产生显著而独特的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的重大举措。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简称管理学院)是浙江工商大学历史最长、规模较大的一个学院。其前身是1978年成立的企业管理系,2001年改设工商管理学院。学院拥有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和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其学科基础主要是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学1996年成为原国内贸易部重点学科,1999年后一直是浙江省重点学科,2006年被评为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2年升级为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该研究基地始终围绕“组织、战略、创新”三个最具企业发展特征的领域加以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套丛书正是其中的

代表。

本套丛书以中国企业行为治理机制为核心,分为“公司治理卷”“转型升级卷”“组织伦理卷”“战略联盟卷”“社会责任卷”“领导行为卷”“运营管理卷”7卷,从各个视角详细阐述中国企业行为治理的理论前沿及现实问题,首次对中国企业行为治理的发展做了全面、客观的梳理。丛书在内容上涵盖了中国企业行为的主要领域,其中涉及战略、组织、人力、创新、国际化、转型升级等宏观、中观、微观层次,系统完备;立足学术前沿,所有的分卷都是所属学科的最前沿研究主题,反映了国内外最新的学术发展动态;所有分卷的作者均具有博士学位,是名副其实的博士文集,其中包括该领域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和学者;所有分卷的内容都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基金的资助项目,体现了较强的权威性,符合国家科研发展方向。

该套丛书既是我们对中国企业行为治理领域相关成果的总结,也是对该领域未来发展方向探索的一次尝试。如果这套丛书能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一些基础性、建设性的建议,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谦逊而执著,谦恭而无畏”既是第五级管理者的特质,也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愿中国企业行为治理研究能够真正实现“顶天立地、福泽万民”!

郝云宏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博导

2014年11月15日于钱塘江畔

摘 要

21 世纪以来,在转型升级背景下,在人口结构变化、全球化和数字化的驱动之下,企业和区位开始了新一阶段的再匹配,呈现出新一轮的企业迁移浪潮。加速的企业迁移活动不仅包括大量传统的、指向相对落后区位的知识利用型迁移,也存在大量指向相对发达区位的,以获得新的核心知识为目的的知识获取型迁移。但是,面对外来者劣势,企业的迁移成长之路注定不平坦。大量迁移企业难以在目标区位利用或获取核心知识,而又不得不承担更高的运营成本,损失颇大。这就凸显了一个核心问题:企业如何通过区位迁移实现有效成长?

对于企业迁移的微观机理,已有研究主要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行为视角和制度视角开展了深入研究,得到了以“一个核心指向、两个基本要素、三个关键环节”为特征的企业迁移过程研究框架。其中,一个核心指向是指企业迁移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企业与区位的动态匹配;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三个关键环节的迁移决策,即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移后成长;这三大迁移决策又依赖于两大关键要素,即企业与区位在知识效率和制度合法性两个方面的因素。围绕这一框架,已有研究关注了企业迁移意愿形成,但是对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移后成长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基于行为视角和制度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

总体来说,企业迁移已经获得了丰富的结论,但是由于不同研究之间缺乏一个共享的企业迁移研究概念框架,使得研究之间的对话不够充分,限制了企业迁移研究的深入发展。为此,本书的研究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企业迁移研究的整合性框架,推动企业迁移理论研究

的整合;二是,围绕所提出的企业迁移整合性框架,重点对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移后成长进行实证研究。为实现以上两个研究目标,本书首先通过理论研究构建了企业—区位共演框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企业迁移的三阶段过程机理模型。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开展相应的实证研究,分别是“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中国上市后公司总部迁移为例”“群体迁移背景下的企业迁移同一区位机理研究”“企业迁移后成长机理研究:以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为例”以及“基于企业—区位共演的企业迁移过程机理案例研究”。通过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本书得到了以下六个方面的研究结论。

第一,企业—区位共演框架有效整合企业与区位层面的知识/资源与制度性因素及其互动机理,为企业迁移研究提供了整合性分析框架。企业迁移最新研究成果回顾表明,企业迁移已经形成基于过程视角的研究框架,但是还缺乏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来推进企业迁移过程研究。本书在界定区位和企业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主要观点有三:一是,区位的异质性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基础,主要体现在制度体系和资源体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基于合法性的互动上;二是,企业的异质性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主要体现在制度层和知识层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上;三是,企业—区位共演框架是企业层面的知识与制度维度与区位层面的资源体系与制度体系两个维度的共同互动。

第二,基于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企业迁移过程中的三个关键决策点,取决于企业对区位的知识效率和制度合法性评价,而这一评价又取决于企业层面因素与区位层面因素的互动。一是,企业迁移意愿的强化取决于企业对所在地知识效率和制度合法性的悲观评价,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与所在地的资源体系和制度体系的互动(具体见图4-1)。二是,各个备择目标区位的比较取决于企业对各个备择区位知识效率和制度合法性的评价,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与各个备择区位的资源体系和制度体系的互动(具体见图4-2)。三是,迁移企业在迁入地的成长取决于迁入企业在迁入地的知识效率和制度合法性提升,而这又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与迁入地资源体系和制度体系的互动(具体见图4-4)。

第三,对于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企业层面的区位关系承诺和网络嵌入是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直接因素;区位层面的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和制度距离则通过企业层面因素间接影响企业总部目标区位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总部迁移的多指向现象。对于总部迁移区位选择,已有研究提出了集聚优势拉动观,但不能解释总部的多指向迁移,特别是逆集聚迁移现象。本书实证分析了区位层面的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和制度距离、企业层面的区位关系承诺和网络嵌入,对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一是,区位层面的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和制度距离是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重要激发因素;二是,企业层面的区位关系承诺和网络嵌入是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直接因素;三是,企业层面的各个具体维度在影响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方面,还存在复杂的内在关系。

第四,群体迁移背景下,企业群体迁移至同一区位是集聚优势获取、多市场竞争以及制度合法性获取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烟花效应的形成动因,已有研究基于经济理性和制度合法性分别提出了集聚优势获取、多市场竞争以及合法性获取等三大动机,但是对于三大动机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书综合三大动机理论,以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为基础,结合跨国电气企业和本土温州市乐清电气企业共同迁入上海市发展的案例,构建了区位产业集聚发展视角下的企业群体迁移动机模型,实证揭示了三大动机理论之间的互补关系。

第五,迁入地优势、企业与迁入地匹配性对迁移绩效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但是具体迁入地优势的获取依赖于企业在迁入地相应的(甚至可以说是特定的)关系承诺与网络嵌入,否则反而会给迁移绩效带来负向交互效应:一是,总部集聚优势跨度会通过知识收益和知识成本两种途径影响企业在迁入地的知识效率,从而使得总部集聚优势对迁移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二是,总部集聚优势跨度与企业在迁入地的关系承诺对企业迁移

绩效存在差异化的交互效应,这体现了不同关系承诺方式对总部集聚优势跨度的差异化的杠杆效应;三是,总部集聚优势跨度与企业在迁入地的网络嵌入对企业迁移绩效存在负向的交互效应,这体现了不同关系承诺方式对总部集聚优势跨度的差异化的杠杆效应。

第六,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下,影响企业迁移的区位层面因素和企业层面因素存在复杂互动关系。一是,按照企业的可影响程度,区位层面因素可以分为:企业难以影响,也难以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因素,例如区位的产业诚信环境、区位的治安环境;企业难以影响,但是可以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因素,例如区位的土地资源供给、劳动力丰裕程度、融资便利性;企业可以进行直接影响的因素,例如区位政府服务的七个因素。二是,在企业层面,企业的知识差异能否影响企业迁移意愿取决于集群企业对区位知识效率的评价;这依赖于“能力强”的集群企业对知识隔离机制、知识落差、对当地知识依赖性以及对当地制度影响力的综合考量。三是,从知识效率的角度来看,对所在区位知识效率的不满强化企业迁移意愿的主要动因。四是,潜在目标区位更高的知识效率期望,匹配以合理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企业迁移的最终目标区位选择。五是,企业群体迁移至同一区位体现了三种逻辑的并存。

基于企业—区位共演框架,本书对企业迁移过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推动了企业迁移研究的理论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整合已有理论,构建了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为企业迁移研究奠定了系统的研究框架;第二,基于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从过程视角构建了企业迁移三阶段过程机理模型,促进了企业迁移理论模型的系统建构;第三,基于企业—区位共演框架,揭示了区位层面因素与企业层面因素对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有效解释了企业总部迁移的多指向现象,推动了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研究的深入;第四,基于企业—区位共演框架,归纳了企业群体迁移至同一区位的集聚优势获取、多市场竞争以及制度合法性获取等三种动机,并从区位产业集聚发展演化的角度提出了三种动机具体作用机理,推动了企业群体迁移至同一区位研究的深入;第

五,基于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分析了迁入地优势、企业—迁入地匹配性对总部迁移绩效的影响,推动了企业迁移后成长机理研究的深入。

Abstract

In 21st century, with the driving power of demographic change, global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firms and location begin a new period of matching and present a new wave of firms relocations. Accelerated firm relocation activities include not only a large number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exploiting relocation, which direct to developing location, but also a large number of knowledge exporting relocation which direct to the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 to obtain the core of new knowledge. However, with the liability of outsiders, the relocation of the firms and its growth path doom not to be smooth. A large number of relocating firms are difficult to use or obtain the core knowledge in the target location, but have to bear higher operating costs, thus, the loss is considerable. That highlights a core issue: how can firms achieve effective growth through firm relocation?

As for the micro mechanism of firm reloca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mainly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 and yield a process framework of firm relocation characterized by "one core direction, two basic elements, three key links". Among them, one core direction means that the core goal of firm relocation is to achieve dynamic match of firm and location, which depends on the relocation decision of three key points, namely the intention formation of relocation, target location selection and growth after relocation. These three relocation decisions depend on two key

elements, which are the knowledge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concerning firm and location. According to this framework, prior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intention formation of firm relocation, but seldom on the selection of target location of relocation and firm growth after relocation. Furthermore, prior research mo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while l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

Generally speaking, firm relocation research has obtained abundant conclusions, but due to the lack of a common conceptual framework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es which made the dialogue of the research difficult, thus limited the development of firm relocation research. Therefore, research on this book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tasks; one is to provide a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firm relocation; two is to provide empirically prove for above integrative framework, mainly focusing on location choice for relocation and firm growth after relocation. To achieve the above two objectives, this book builds firm-location co-evolution framework through theory research firstly, and then proposes three stages model of firm relocation based on it.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this book further propos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namely, "firm targeting location choice: a case study on the reloc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 study on the firm relo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roup relocation", "research on the firm growth after relocation" and "a case study of firm relocation process based on firm-location co-evolution". Through the abov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book obtains the following six conclusions.

First, the firm-location co-evolution framework effectively integrates the knowledge/ resources factors,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ve mechanism on the level of firm and location, providing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search of firm relocation. A review of the latest research shows that firm relocation has formed a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process perspective, but still lack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promote the process research of firm relocation. Based on the nature of location and firm, this book proposes the firm-location co-evolution framework, which contains three main standpoints: first, as the basis of location choice, the heterogeneity of location mainly reflects on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resource system and their interaction; second, the heterogeneity of firms is also key to firm location choice, which mainly reflects on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 and resource and their interaction; third, firm-location co-evolution framework is a interaction between firm and location.

Second, based on the firm-location co-evolution framework, the three key decisions in the process of firm relocation depend on the firms' evaluation on the location with the knowledge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whereas this evaluation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of factors in the level of firm and location. First, the strengthen of firm relocation intention depends on the pessimistic evaluation on knowledge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in its location, and this evaluation largely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of firm and location (specifically, figure4-1). Second, the comparison of each alternative location depends on the evaluation of knowledge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in each alternative location. Third, the growth of relocation firm in the relocating-in location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after relocation, which in turn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rm and resource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in the relocating-in location (specifically, figure4-4).

Third, as for the choice of target location for headquarters, regional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and network embeddedness in firm level are direct factors influencing headquarters' location choice; headquarters agglomerating advantages span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in location level indirectly affect the firm headquarters' location choice through factors in firm level, which explain the multi-directional relocating phenomena of headquarters in some degree. For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headquarters relocation, prior research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agglomerating advantage, but it cannot explain the multi-directional relocating phenomena of headquarters, especially the phenomenon of reverse concentration relocation. This book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headquarters agglomerating advantages span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in location level, location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and network embeddedness in firm level on headquarters location choice; first, agglomerating advantage in location level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span in firm level are the critical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headquarters' location choice; second, location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and network embeddedness in the firm level are the direct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headquarters location choice; third, each specific dimensions in the firm level have a complex internal relationship on the target location choice of headquarters relocation.

Fourth, the firms' clustering relocation to the same loc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cquisition of cluster advantage, the multi-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lustering relocation. For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bandwagons, prior research proposed agglomerating advantage, multi-market competition and legitimacy acquisition based on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but researches on the